

深刻认识外来文化
华，甚至取其短期
展的内容与之去。
流中取得食为数
彼这个关键。

深

杨生茂



杨生茂著

本草

集解

中華書局



PD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径集/杨生茂著 . - 北京:中华书局,2002
(南开史学家论丛 . 杨生茂卷)

ISBN 7-101-03557-4

I . 探… II . 杨… III . 美国 - 历史 - 文集
IV . K71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256 号

责任编辑:王守青

南开史学家论丛

探 径 集

杨生茂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河北廊坊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2³/4 印张 · 32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7-101-03557-4/K · 1497

总序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自开设科系至于拓为学院，前后垂八十年矣。肇始之季，史界翘楚，皆欣任教席，其最著者为梁启超、蒋廷黻、蔡维藩、刘崇鋐、范文澜诸公，此数人皆根于博识而详于考实者，于近世皆以典著精审为世所共识。南开史学之博约宏赡，可谓其来有自。解放后院系调整，北大与清华两府史魁郑天挺、雷海宗于南开树帜，一时卓越史家吴廷璆、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黎国彬、来新夏、辜燮高、魏宏运云集而景从，自此以降，半世纪来蔚为国中史学营垒，气象蔚蕤。后继者潜修锐进、不坠薪传，欣睹其旺，南开史学院誉薄海溢，岂徒然哉。

史之为学，司马迁概之曰“述往事思来者”六字。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乃研究史学之大旨。其博学之，谓勿以疏漏也；审问之，谓整纷剔蠹也；慎思之，谓祛惑释疑也；明辨之，谓去伪存真也；笃行之，谓济世匡时也，此数事于南开史学名师之文中有之矣。

即以郑天挺先生《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为例，经先生钩稽玄微，清代统治者，实为汉满蒙古之混合血统，此论既出，则清室“以龙兴东土、朱果发祥之贵胄自炫”之说即告溃萎。先生又详证满洲实为部落之名称，“与国无涉”。而侵略者骄横，欲以清之末世溥仪而立满洲国，于史无据，可称谬妄极矣。读毕真似闻老吏断狱、要言不烦，不禁击节喟叹。又以王玉哲先生《周初三监及其地望问题》一文为例，先生揆诸当时情势，证以史籍、考古，以为周初实力所统辖者有限，“武王所置三监之邶和鄘绝对不可能远到河北北部和山东中

部”。予王国维凭诗人之想像以为“邶即燕、鄘即奄”之说以不复容辩之否决。它如清姚鼐、近人顾颉刚有关三监之说，亦一一驳析，至此三监历史之悬案冰解壤分，豁然大朗。王玉哲先生固温良恭谦让之君子，而于学术谔谔然如此，亦自感责任綦切，不为先贤讳也。

六十余年前杨志玖先生以英发少年，于浩繁之《永乐大典》中发现马可波罗确来中国之铁证，凿凿之说，与西人伯希和并肩，为硕学汤用彤、向达先生所激赏，遂为史界定论。亦有立异眩世者东来讨问，见先生蔼然长者，抱“以文会友”之雅怀，不禁肃然起敬，遂偃旗息鼓西归。要之史学家必有“坚不可摧的证据”（王玉哲先生语）然后立有益当代，泽被后世之言说，前辈懿范，岂可轻忘。

史家之道德，亦有大谬不然者，或如鲁迅先生所讽，为历史“涂抹些自欺欺人的脂粉”；或如刘歆篡改史乘，以为王莽立言。此类史蠹，不绝如缕，为史家立障，难辞其咎。清乾嘉以来，吴、皖学派，考据鼎盛，功不可没。南开史家以勘雠考据、绌绎群书之学视为立论之基石，而不以先验之立论而检索史实为能事，后者直为治史之大痼。知行合一，固为至论，而一切真知，皆来自治史之实践，必以历史之真面为终极追逐。郑天挺先生所言“真理标准决定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历史科学是从争鸣中发展起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说之出为 1961 年，可谓言简意赅，深挈肯綮。

乙未之夏我以十七岁考取南开大学历史系，至今四十六年矣，彼时以能亲聆史学大师警咳为最大荣幸。其时诸师亦皆壮年，滔滔雄词如坐春风，雷海宗先生开世界上古史，其博学强记、考索史实，略无半句废言。至历史紧要处如西罗马帝国之覆亡，则谈兵说剑、飙风扇发，泉飞藻思若此，恐同代诸公，难有望肩者。又如谢国桢先生授南明史略，则对半壁破碎河山中金陵福王、福建唐王、广西桂王之消长慢慢道来，其史籍之烂熟于胸次，如数家珍。不期反右中雷海宗先生

为康生所深恶，必除之而后快，定为史界极右，今虽彻底平反，而枨触前尘，恻焉涕下，曷胜今昔之叹。

今南开大学史学家论丛出版，刘泽华兄属为序，亦欲述其渊源、敦励风尚，以传于后之来者，使知青嶂之远、白云之深，谨惶恐奉命如上。

范曾
壬午夏於南開園



前 言

这本集子主要选收了美国史学史、美国外交史和有关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文章。这都是在漭漭史林中，循着小径，探索前进的足迹。解放前那些关于国际时事评论的文章未收。

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 1964 年。在那年，美国史研究室宣告成立，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 1978 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992 年后科研几乎又停摆了。这近 10 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

老然后知不足。这里所指的不足是学绩。“文革”后不久，曾以“澹泊惜阴”自勉。看来“澹泊”似乎多少做到些，辞谢了许多会议和职务，而“惜阴”则难说有了好的着落。

历史具有相对性，客观事物总是变迁不居的，同时作者对客观的认识也不是常驻不前的。虽然承认认识的相对性，但不等于承认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随声附和的机会主义，同绝对主义是主观主义这枚铜钱的正反面。由于认识到书写历史的相对性，故在选录过去所写的文章时，尽量保存文章的“原汁原味”，因为那是时代的客观的脚步声响，也是作者当时应答客观的心音。这样才能看明白自己在漫长学习和生活道路上所遇到的曲和直。换言之，客观实践才能检验认识的正误。

贯穿自己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是反封建反帝的观念和期望国家

振兴的心愿。1931、1937、1949 和 1978 这几个年代以及这几个年代间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深深印在自己脑海中,自然无不反映在所写文章的字里行间。文与心通,文也与时通。在文章的灌木丛中很易觅得自我。那里没有言不由衷的话,虽然不见得句句都经得起时间的评判。

“文革”结束后,又焕发了振兴国家的期盼。在主观和客观上确实有了“焕发”的机缘。在改革开放的风雨中,人人踏上了百废待举的新征途,随之想到的是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艰险。这几年,梦寐思虑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这件大事,反复阐述的主题是,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这个道理不仅在研究工作中应当注意,对于各项事业也是不可须臾忽视的。

写史应当有论,当然论须依据史实。史学家主要责任是以古悟今,启迪当代人和未来人。在研究中,首先须知晓通史。专而不通,必然目无全牛,失于偏颇。学美国史,首先应当学习美国通史。近年学子往往过于重专,自封眼界。当然通而不专,也会导致散漫无章,但二者相比,通还是根本。

学美国史学史不失为求通的佳径。根据在阐述美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特点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从众多美国史学家中选出 5 个代表。他们是认识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因为从他们各自阐述的通史领域里可以抚摩出美国历史跳动的脉搏。例如,从乔治·班克罗夫特的“通史”中,可以嗅到显明天命论、种族优越论、美国例外论的气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也曾点拨过海外扩张政策的决断者们。威廉·阿普曼·威廉斯从通史角度论述美国“门户开放”扩张政策的轨迹,同查尔斯·比尔德一样,也曾述及这种扩张力度的极限性。威廉斯曾长期被拒于美国主流学派史坛之外,但历史的演变无不证实其预测的一定的可信性。

一些开明的美国的外交史学家,虽然同那些冥顽自私的“官方史

学家”和保守的主流派史学家所持看法有所不同，但也无不受到单边国家利益观的局限，以及传统教育打造的扩张主义使命观的熏染。他们只能就事论事，很难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美国以外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反而能看清实质性问题，并对极端利己主义的强权政治予以笔伐。这可谓旁观者清。的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里录下一首 1992 年写的自赏自得的小诗。它胜似千言万语，表达了我的心境——一种缠磨与激荡的心境。

过去，让它过去吧，
今天才是常青的，
永远可从现在，从脚下迈出新的步伐。

回忆等于折磨，味道是辛涩的，
有时会勾起脉搏的撞击，终宵不眠，
而老人越老越难逃出这种恍惚的困境。

当然，过去也有欢乐的笑声和美好的憧憬，
回味起来，
还可拾到许多欣慰的片鳞只爪。

曾记起：四十六年前由异域归来时，
塘沽通北平的铁路两侧尽是荒滩枯草，
即使那时，
也恨不得跳下车去，捧起黄土，重重亲吻。

又记起：皓首进京，

每当走过少年熟识的天安门时，
看见簇拥的鲜花，
看见红彤彤的高墙，
看见这片祖国壮丽山河的象征，
感动得热泪盈眶。

应明白佳酿中有股股冤情苦水，
苦水中也有激励奋进的佳酿，
十全十美，只可到童话中去寻找。

聪明人，不应沉浸于已经逝去的一切，
从苦水中吮吸些香醇吧，
那怕是点滴，
为了明天，为了来人。

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话，
可能不会有现在这种固执、自矜和恶俗，
而民族忧患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
至于个人，毕竟是沧海中的一粟。

在编辑过程中，填补注释中的外文人名、书名、地名和出版处的工作费了许多时间。十几年前，各杂志的编辑部不要求注出原文，后来可能由于改革开放步伐的催促和电子计算机的推广，原文名称方进入注释。此外，还对注释体例、译名和数字用法尽可能地予以统一，对文字也进行了个别修改。

本集的问世得力于许多同事和同学的鼎助。首先感谢的是范曾教授。他慷慨解囊，资助一套文集丛书的出版，这本集子忝列其间。

刘泽华和张国刚教授担负了组织和规划工作。剑鸣编制了本集的框架,在安排编辑程序和校勘方面也耗费了大量精力。晓德、学功和令侠编辑整理了原稿。丁见民和韦军亮两位同学查补了外文名称。这里向以上同志表示感激。对于文中出现的错误和纰漏,应由作者负责,并请读者不吝指正。

杨生茂
2002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	
——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	(1)
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	(19)
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	(69)
漫谈美国外交史学	(99)
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 – 1989)	(105)
1981 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120)
 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的几个问题	
(129)	
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	
——为《美国外交政策史》所作的导言	(165)
试论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	(184)
“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	
——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	(194)
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一个评价	(228)
 学史杂拾	
(264)	
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	(269)
克服偏向 以理服人	(277)

我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看法

- 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 30 周年而作 (280)
述怀志念 (284)
浮想联翩——世纪之交有关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86)
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
——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 (289)

- 识时务者为俊杰——从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起 (295)
从麦克纳马拉的反思说起 (298)
访英、希散记——历史篇 (301)
《历史教学》创刊第一年 (311)

- 《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读后感 (314)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一书读后 (318)
博而蓄约 大而存精
——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读后感 (323)

- 《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序 (329)
《东亚与太平洋国际关系
——东西方文化的撞击(1500 – 1923)》序 (332)
《梦想与现实——伍德罗·威尔逊
“理想主义”外交研究》序 (334)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序 (338)
《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 – 1995)》序 (340)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序 (343)

附录

- 杨生茂自述 (347)
杨生茂教授小传 李剑鸣(356)
杨生茂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 张宏毅(364)
“洋为中用”与美国史研究 华庆昭(385)
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 李剑鸣(394)
杨生茂教授著述举要 杨令侠编(406)



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

——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成千上万。如何评估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是个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如获得“杰出”称谓，须具备三个最基本条件：第一，在其研究领域，能鉴别吸收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分析其不逮之处；第二，在本研究范围内，能有所创新，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或能积极应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第三，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尽可能地起到有益的启迪效用。

历史长河是后浪推前浪，一往无前。长河中有急流险滩，有汹涌澎湃的狂澜，也有叮叮咚咚的潺流。划行其间的人所经历的航道不会是笔直的，喜怒哀乐各有不同。有的有艰辛的痛苦感，有的有欣慰自得和进取不息的兴奋感。杰出的历史学家是坚强不懈的弄潮儿，能学以致用，即致社会进步之用。他们探索资料，注释往事，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其目的在于使同代人有一种共同感和责任感。历史学家的社会效益就在于此。这也是评估杰出历史学家的重要准则之一。

依据这些认识，笔者曾评述过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威廉·阿普曼·威廉斯，试图在这两个杰出历史学家的业绩中上溯下联，审视他们在美国史学发展中鉴别吸收了什么，对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起过什么影响，并有什么学术遗产留给后代。现在以同样的认识来评估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

美国史学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独立战争至19世纪70年代为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二阶段，二

次大战后为第三阶段。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历史的重建》一书中划分的三个阶段是：17世纪、18—19世纪和19世纪末以来。^①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也将17世纪和18世纪作为两个阶段。^② 我认为，17世纪和美国独立前的18世纪不应纳入美国史学史的组成部分，只可视为美国史学发展的背景。美国史学史应从独立革命运动开始计起。就我所厘定的标准言，班克罗夫特、特纳和威廉斯应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杰出的史学家。从社会发展角度，把这三个历史学家联系起来，即可概括美国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在他们三人以外，若再加上两位重叠前后的过渡性史学家，即19世纪末的亨利·亚当斯以及二次大战前夕萌发并至战后盛行的“一致论”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基，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就更加清晰。埃里克·方纳于多年前曾写道，由于“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意见一致论’已被粉碎了，至今尚未出现一种新理论能填补这项空白”；而美国史学中出现的支离破碎现象，“妨碍了建立一个连贯的研究美国历史的新理论的努力”。^③ 因此上述5个史学家在美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了。威廉·阿普曼·威廉斯就对外政策这个美国史上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的方面作了历史考察和理论阐述，足以反映整个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方纳对此并未予以足够的估计。在评介威廉斯外交史学一文中，我已对一致论史学流派做过阐述。今拟在叙述班克罗夫特史学时，对亨利·亚当斯也做些评论。

这五位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的共同显著特点是，都较精明地回

① 约翰·海厄姆编：《美国历史的重建》（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62年版，第10页。

② 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美国史学史》（John Franklin Jameso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America*），纽约1891年版，目录页。

③ 参见埃里克·方纳等：《新美国历史》，齐文颖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顾过去的历史,从中吸收他们认为有价值的遗产,并经过消化,提出了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影响的论点。他们直面社会,议论风发,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对当代人起到激励、鼓舞、启发反思的效用。

这五位史学家在治史的细节上又各具特点,异同参半。他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资料收集,但使用资料的方式不尽相同,如班克罗夫特烦亲托友在国内外搜集资料,但有时随兴释义,不时引起当代人的抗议。^① 威廉斯著书立说时,虽然科学史观已发展了一个世纪之久,但他在史料应用方面不免粗枝大叶,为时人所讥诮。^② 这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也不宜以其学术著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中有的人写断代史,有的写通史,有的写卷帙浩繁的巨著,有的只发表精悍的论文。其中一锤定音的史学业绩不在于著作数量和长短,而在于能有发人情愫、动人心弦的观点和思路,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教益的宏论要旨。这五位史学家中,只有布尔斯廷写出 3 卷本通史,井然有序地阐发论点。威廉斯虽以写作外交史专著为主,但也试图从通史角度印证其观点。班克罗夫特虽然写出 10 卷本巨著,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所写的只不过是断代史。1874 年出版的第 10 卷,只写到独立战争的结束;1882 年又出版两卷,才续至美国宪法的制定。特纳和亨利·亚当斯都是以发表论文声誉鹊起,在当时史学界激起汹波巨浪。亨利·亚当斯曾出版过 9 卷本巨著,论述杰斐逊和麦迪逊时期的政治,但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瞩目的,还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

^① G·P·古奇:《19 世纪历史和史学家》(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伦敦 1913 年版,第 405 页。

^② 如斯托顿·林德:“评《美国历史的轮廓》”(Staughton Lynd, “Book Review”: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Contour of American History*),《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第 27 卷,1963 年第 2 期,第 227 页。